

应用符号学在英译“人民”时的应用

□ 赵心树 李 聪

自2003年以来,赵心树等(赵心树,2003;2004a,b,c;2005;赵心树等,2004;钟新,2006)提出了一套关于细释冠名的理论,并运用这套理论分析一些常用概念及其符号,指出了多种名实错位和混淆,也就是符号与概念严重分离或模糊的状况,并提出了正名的建议。

例如,赵心树(2004a)指出,把“中国共产党”翻译成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的习惯做法是错误的,因为1)英语中 communist 有强烈的贬义,而“中国共产党”中的“共产”是中性或褒义的;2)英语中 party 代表不拥有永久执政权的政治利益团体,而“中国共产党”中的“党”更接近于一个政权机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广义)政府架构中的一个中心部门。这个误译不动声色地、经常不断地、涓滴成海地妖魔化中国政府、中国领导人以及整个中国在英语世界的形象,侵损着中国人民的利益。据此,赵心树提议为“中国共产党”寻找更为恰当的英译,并提出 Chinese Council of Leaders 作为一个选项。

又如,在接受钟新(2006)采访时,赵心树提出,“新闻学”和“传播学”以两个符号交叉代表三个不同的概念,造成许多本可避免的错误理解、模糊理解和矛盾冲突。据此,他建议为整个学科和相关的子学科正名,用“传播学”、“新闻学”和“基础传播学”这三个不同的符号分别代表三个不同的概念,让“传播学”代表整个学科,其中包括“基础传播学”和“应用传播学”,而“应用传播学”中又包括“新闻学”、“广告学”、“公关学”以及其他应用子学科。

本文将把上述理论和冠名实践统称为“应用符号学”。我们将进一步发展这一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来分析含有“人民”的中文词汇的英译。我们将指出,现在流行的“标准”翻译有许多欠缺,需要改进。

应用符号学中的“词字译”与“传通译”概念

流行的观念认为,外文符号、中文符号、指称对象这三者之间存在一个“唯一正确”的组合,这个组合可以也只能从词典里找到。背离词典的翻译都是错误的,有欺骗之嫌。按照这一理解,由于在词典里 China 就是“中国”,Communist 就是“共产”,party 就是“党”,把中国共产党翻译成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或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似乎是唯一正确的,其他翻译都属欺骗。赵心树(2004a)称这种观念为“词字翻译”,本文将简称其为“词字译”。与词字译相对,赵心树(2004a)主张“信息翻译”。鉴于翻译界有时用“信息翻译”表达另外的概念,本文将赵心树的概念改称为“传通翻译”,简称“传通译”。根据传通译的理念,信息的有效而准确的

传通是翻译的唯一目标。当这个目标与词典、教科书或传统习惯译法相冲突时,应当搁置或修改词典、教科书和传统习惯译法,而不应盲从。本节将进一步发展和说明这个理论。

图1描述了词字译与传通译的流程区别。其中甲1→甲2→甲3的流程显示,在单语传通中,传者通过本族语言符号表达原意,受者从同一个语言符号中再创意。如果受者脑中呈现的意义百分之百再现了传者的原意,那就是完美的传通。而实际上,这样绝对完美的传通很难实现,在信息比较复杂时尤其如此。这是因为,所谓意义的再创并不是受者大脑简单地接受语言符号中的信息,而是新接受的语言符号激活部分脑中原有的一部分信息观念,与这些信息观念结合,而构成新的信息观念组合。由于每个受者原有的信息观念构成多少有些不同,所以再创的意义不仅很少百分之百重现传者的原意,而且不同受者所创造的意义相互之间也多少有些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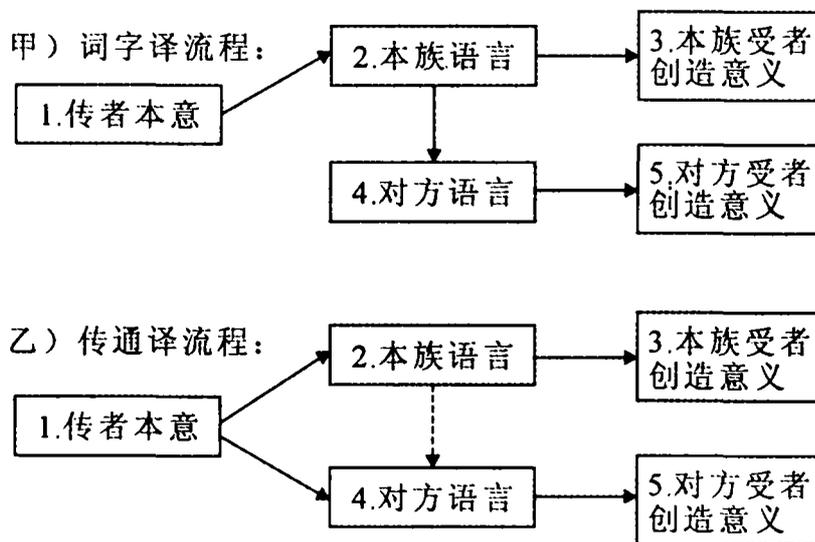


图1 词字译与传通译

单语传通尚且难以做到完美无缺,跨语传通则更难,因为信息损耗更大,误传的机率也更大。图1中,甲1→甲2→甲4→甲5的流程显示跨语传通的一个重要特点:它的受者与单语言传通的受者不是同一群人,与传者也不在同一个语言文化圈中。对方受众脑中原有的信息观念构成与传者脑中以及本族受众脑中的信息观念构成很不一样,所以,对方受者再创的意义不容易偏离传者的本意,而且往往与本族受者再创的意义很不一样。

图1中,甲1→甲2→甲4→甲5的流程凸显着跨语传通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对方受众所接受的语言符号(甲4)不同于传者使用的语言符号(甲2)。流行的机械翻译把两种语言符号对照词字进行转换,于是把单语传通中的三步流程变成了跨语传通中的四步流程,多一步就多一个信息损耗和误传的机会,于是就增加了对对方受众误解传者原意的机率。

图1中,乙1→乙4→乙5的流程显示了传通译的理念:遇到关键的概念,翻译者应当努力进行“抽名思维”,也就是绕过传者原用语言符号(乙2)的羁绊,努力用受众所用的语言符号(乙4)去直接传递传者的原意(乙1),以尽可能减少信息损耗和误传,使得受众脑中再创的意义(乙5)尽可能接近传者的原意(乙1)。从乙2到乙4之间的虚线箭头则表示,在进行传通译的时候,翻译者仍然可以参考两种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借助词典和其他工具书,但这只是辅助。

图1的乙3与乙5显示,在跨语传通中,即便采用了传通译,其受众仍然不同于单语传通

的受众,所以,其信息损耗一般仍将大于单语传通的信息损耗。但是,传通译把信息损耗的两个主要源泉减少为一个,于是就大大减少了损耗。

如何英译“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和其他“人民”政权机构?

让我们把上述应用符号学理论运用到一个实例:如何翻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省区市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权威词典中列出的标准译法是 People's Congress,其中 Congress 是世界各国立法机构通用的名称,应无疑义。但此前有无必要加上 People's?

2004年11月,恰逢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个参访团访美,我向为该团服务的两位英语翻译提出这个问题。他们随手拿出汉英词典,找到“人民代表大会”条,指出词典的英译中包含了 People's。在他们看来,这就足以证明加上 People's 很有必要。这是上文谈到的词字译和词典迷信的又一例。此前的2004年夏天,我在北京向中国外交部的一位英语专家提出同样的问题。他显得吃惊:“‘人民’译为 people 也有疑义吗?总不能不译‘人民’吧?”这是词字译的又一例。

现代英语中的 Congress 源自拉丁语,原意是“会议”。谁的会议呢?现代英语中 The Congress 普遍特指立法机构,而不再代表任何其他会议或机构。立法机构天然具有垄断性——同一个国家或地区内,不能有两个相互竞争的立法机构^①,于是这个唯一的立法机构就必须为全体人民服务,于是现代西方各国的立法机构的决策者就都由民选产生,于是 The Congress 就意味着“全体人民的立法机构”。因此,在 Congress 前加上定语 People's,给西方受众的第一印象是画蛇添足:为什么要称“人民的全体人民的立法机构”呢?难道还有“不属于人民的全体人民的立法机构”吗?在了解战后历史的人们看来,与其说是画蛇添足,不如说是冷战残余:当年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政权机关在自己的英语名称前刻意加上 People's,是要强调只有我们的政权才真正属于人民,言下之意,你们(西方国家)的政权不属于人民,而属于压迫人民的反动统治阶级。所以我们支持各国人民的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推翻反动政府,解放全人类。

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政治制度持批评态度的西方人,在 People's 这个定语中还常常读出一丝讽刺:正因为你的政权机构不是民选的,不属于全体人民,你心虚了,所以要额外加上 People's 来强调你的“人民性”,就好比“此地无银三百两”。

一部分了解中国文革中“阶级斗争”的西方人,还会从这个 People's 读出另一层意思:毛泽东和四人帮所说的“人民”与西方人所说的“人民”不是一回事。在西方,凡公民都是人民,其中甚至包括犯罪服刑人员。作为对犯罪行为的惩罚,服刑者的部分公民权如自由行动权被暂时剥夺,但他仍然是人民的一员,仍然享有人权,一旦刑满,意味着罪与罚已经相抵,他就自动恢复了几乎所有的公民权,而不会继续被看作是“另类”。由于没有法定的“非人民”,再加上民选制度迫使领导机构为民,所以政权机构服务于全民是不言而喻的。因此,西方政权机构和军警名称不冠以 people's。与此对照,在当时的中国,公民被分为“敌我友”,即“人民”之外还有“人民的敌人”和“人民的朋友”。不但犯罪服刑人员自动成为敌人,刑满释放人员仍然是敌人,连从未入狱的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走资派、黑线人物、保皇派,甚至“漏网右派”、“漏网反革命”、“摘帽右派”等等,统统被看作是阶级敌人,斗争对象;只有工农兵和革命干部才有资格享受人民的待遇;而知识分子、职员、技术人员和民主党派成员等被看作是可以教育改造的“朋友”。当年,在政权机关的中文名称上冠以“人民”,是要强调这是一个阶级性的机关,是用以组织人民、团结朋友、镇压敌人的,而不是服务于“全(体)公民”的。今天,随着“三个代表”理论进入宪法和中共党章,中文“人民”已经完全失去了这一层阶级斗争的含义。但是,在英文中,政权机关的名称前所冠的 People's,给这部分西方人发出这样一个过时而错误的信息:这

个政权只属于一部分中国人,而不属于全体中国人,中国还可能重拾阶级斗争的国策,还可能重演文革。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在代表大会、政府、法院、检察院、警察、军队等政府机关或武装力量的中文名称前冠以“人民”,主要是对着中国的受众发出这样的信息:上下数千年,旧中国的政权军警都不属于人民,而是压迫人民;而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子弟兵,是为人民服务的。于是有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法院、人民警察、人民解放军等等。在当时的中文语境中,这一信息被普遍接受了,因为民国政府虽然声称为民,却被普遍认为是代表着大资本家、买办、地主和军阀利益,此前的历代皇朝更是明目张胆地宣称“君天下”,与此相比,共产党依靠贫苦农民和广大工人打江山、坐江山,代表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50多年后的今天,由于比照对象消亡已久,这个信息不再有现实的意义:在中国大陆上,并不存在另一个不属于人民的政府、不属于人民的代表大会、不属于人民的法院,不属于人民的警察;于是这个“人民”就变成了一个传统遗留而基本不含信息的冗词。例如,“省人民政府”被普遍简称为“省政府”,“人民法院”被普遍简称为“法院”,“中国人民解放军”被普遍简称为“中国军队”,而不会发生任何误解或歧义。

但是,当“人民”被机械地翻译成 *people's* 展现在今天的西方受众面前的时候,就完全走样了,变成了以上说明的那种混杂着自卑、自傲和好斗的信息。这显然不是中文说话人意图发出的信息,是明显的误译。因此,按照传通译的原则,“人民代表大会”的英语名中应去掉 *People's*, 成为 *The Congress*, 在有些语境下可以加上定语 *Chinese* (中国)、*national* (全国) 或 *provincial* (省) 等等。

从传通译的原则出发,考虑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国政治制度中的实际地位,把它翻译成 *Senate* 更为合适,这一点我们将另文详谈。通常,*Senate* 是立法机关的“两院”之一,另一院常被名为“*house of representatives*”,有时也称 *the Assembly* 或 *the General Assembly*。而 *Congress* 通常兼指两院。通盘考虑,我们可以把人民代表大会译为 *The Assembly*, 把人大常委会译为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把政治局译为 *the Senate*, 政治协商会议沿用原译,然后用 *Congress* 来统指所有这些机构。

类似地,在英译其他政权机关和武装力量的名称时,都不应该盲目照搬词字,机械地翻译“人民”,生硬地把 *people's* 塞进英文名中。例如,“人民政府”应译为 *the government*, “人民法院”应译为 *the court*, “人民检察院”应译为 *the procuratorate*, “人民警察”应译为 *the police*, 等等;然后根据其层级加上 *supreme* (最高), *provincial* (省), *city* (市) 等修饰词。

如何英译“人民解放军”?

传统上把“中国人民解放军”译为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简称 *PLA*。除 *People's* 之外, *army* 也有问题。现代英语中的 *army* 单指陆军。例如今日美国陆军就叫 *U. S. Army*。包含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②和国民卫队在内的整个武装力量的总称不是 *army*, 而是 *Military* 或 *Armed Forces*。1949年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几乎只有陆军,当时英译 *army* 虽缺乏预见,但还不能说错。今日的解放军包括了海、陆、空、导弹和武警等多个军种,就不能译为 *army* 了。

Liberation 也有问题。*Liberation* 意为解放。1949年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目标是把中国人民从国民党统治、地主阶级盘剥和帝国主义侵略之下解放出来。1949年以后,全国大多数地区都已经被解放了,香港澳门已经回归,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任务已经从“解放”转移到“守卫”。虽然台湾还没有被统一,但解放军的任务已经不是“解放台湾”,而是在必要时用武力防止分裂。尽管如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称不变,却没有引起问题。为什么?因为在中文的语境中,由于经常接触,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词,已经习惯地把它当作

一个整体概念来理解,不会再去拆解它,去解读“人民”、“解放”这些部件词的意义。在今天的日用汉语中,这个词中载有实质信息的是“中国”与“军”——有了“中国”,我们才知道说话者不是在谈论美国、俄国或朝鲜的军队,有了“军”,我们才知道说话者不是在谈论中国的体育系统、司法系统、演艺界或医疗卫生系统;而“人民”与“解放”早已失去了它们的实用信息功能,成了冗词,因为中国并不存在另一支全国性的不为“人民”不叫“解放”的军队。

但是,当人们按词照句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机械翻译成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f China 的时候,不经常接触这个概念的西方人就要从部件词的意义来猜度这支军队:他们要解放谁呢?解放台湾人民?但是台湾已不是 1949 年以前的台湾,虽然许多台湾人反对独立,但绝大多数台湾人基本上满足于现在的生活,希望维持和平,反对战争,几乎没有人盼望被武力“解放”;正因为此,中国大陆政府和解放军早就不谈“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了。既然如此,解放军要解放谁呢?是不是国境外历史上的失土?是不是其他国家受苦受难的人民?他们是不是还想输出革命呢?随着国力和军力的增长,他们是不是正在对别国构成威胁?

在中文的语境中,这样拆解难免遭到指责:“解放”是历史留下的名称,何苦于无意义处强求意义,掘隐索微,发挥夸大,无限上纲!但是,在英文的语境中,在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国历史和现状都不甚了了的情况下,这却是西方人初见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时的第一反应,其中包括我的美国学生、同学和朋友。

对于美国人的这种反应,一些国内朋友的第一反应是:“美国人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他们都受了美国媒体的欺骗误导!”我的问题是,在批评美国人民无知、媒体误导的同时,中国人能不能多想想,自己该做点什么来减少无知和误导呢?譬如说,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文名称中去掉 liberation 和 people's,把它译为 Chinese Military,既简单明了,又防止误解,何乐而不为?

如何英译“人民大学”、“人民日报”、“人民出版社”?

国内有一个单位已经从英文名称中去掉了 People's,而维持中文原名不变。这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它对自己的英文名称采取了音意合译,也就是音译“人民”,意译“中国”和“大学”,成为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简称 RUC。

其实,在冠名“人民”的单位中,有一些是可以意译为 people's 而维持其褒义的,其中就包括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银行、《人民日报》、各地的人民出版社和人民医院。也就是说,《人民日报》现译为 People's Daily,“中国人民银行”现译为 People's Bank of China,各地“人民出版社”现译为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许多“人民医院”现译为 People's Hospital,都译得很好;“中国人民大学”曾经被全意译为 People's University of China,其实也译得很好,没有必要改为音意合译。

这是为什么呢?

英语中的 People's 本身不含贬义。它有时指某地某国的“全体人民”,例如美国宪法一开头的三个词 We the people 就是指美国的全体人民,有时又指“平民百姓”,与贵族富人相对。两者都有强烈的褒义。

如以上解释的,垄断的政权机关必须为全体人民服务,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在此类政权机关名称上冠以意为“全体人民”的“人民”,那是画蛇添足,反有此地无银的嫌疑,特别是当这个政权的领导人的产生过程不尽民主时,这个“人民”就更成了讽刺;如果把这个“人民”解释为排斥贵族富人的“平民百姓”,那就更不对了:垄断的政权机关,包括军警,不能只为一部分人服务,而必须尽可能平等地为所有人服务。

但是,媒体、学校、银行、医院不是垄断性的政权机关。媒体与媒体竞争,学校与学校竞争,银行与银行竞争,医院与医院竞争;虽然竞争的结果是它们共同为全体人民服务,但是,某一家

报纸、大学、银行、医院可以为这一群人服务,另一家报纸、大学、银行、医院可以为另一群人服务。于是,有的为富人贵族服务,有的为平民百姓服务。于是,在英语中 people's university 是一个常见的词组,不含讽刺,也与冷战无关,而是指“平民百姓的大学”,与学费高昂、面向富人子弟的私立大学相对照。例如,作为一个主张教育平等的州立大学,我所在的北卡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的师生员工就常常以“People's University”自嘲,含沙射影地批评邻近的竞争对手私立“贵族大学”(Duke University)^③。纽约市立图书馆藏书丰富而免费开放,为各色人等提供了学习提高的机会,因而被赞誉为 people's university (平民的大学)。

这样,人民医院译为 people's hospital, 其中的 people 也可作“平民百姓”解,与收费较高的其他医院和私人诊所相对照。人民出版社译为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其中的 people 既可作“全体人民”解,也可作“平民百姓”解,以区别于为部分或特殊读者群服务的专业出版社。中国人民银行是唯一的国家中央银行,但它不是唯一的银行;其他银行可以为不同的顾客群服务,而中国人民银行等一两家国家银行必须通过制定和执行国家的金融政策而为全体中国人服务,称其为 People's Bank, 其中的 people 作“全体人民”解,非常合适。《人民日报》作为国家政权中心的党中央机关报,理论上面向全体人民,自称 People's Daily, 以“全体人民”与其他的方报、行业报、青年报、老年报、儿童报等等相区别,也顺理成章。

打个比方,在“车辆”前冠以“机动”,成为“机动车辆”,传递了有用的信息,因为车辆可能是机械推动,也可能是人力推动或畜力推动。但若在“汽车”前冠以“机动”,成为“机动汽车”,就变得毫无意义,且使细心的读者生疑:既然所有的汽车都理应机动,为什么还要画蛇添足地特别标明?你是不是在指责我或别人的汽车其实并非机动?或是你说的“汽车”与“机动”含有与众不同的意义?若“机动汽车”仅在日常谈话中偶尔脱口而出,人们未必深究。但若出现在理应字斟酌酌的公司名称、商店招牌或品牌口号中,就难免被人看作是无知、好斗、尖刻或没有文化。

同理,中国各地有时见到“诊疗药房”的招牌,不会叫人觉得别扭,因为许多药房只卖药而不提供诊疗服务。但是,从未见“诊疗医院”的招牌,因为大家知道,不诊不疗就不是医院了。“饮食小铺”是合适的招牌,因为有的小铺不提供饮食;“饮食餐馆”就叫人生疑——你是否暗指竞争者出售的不是饮食?“住宿小店”是合适的招牌,因为有的小店不提供住宿,但“住宿旅馆”就荒唐——难道还有不能住宿的旅馆?

总之,译名中用还是不用 people's 这个词,要看冠名对象的性质,如果它具有垄断性,在西方受众看来不言而喻必须为全体人民服务,就不应冠以 people's; 如果它不具垄断性,在西方受众看来可以为全体人民服务,也可以只为一部分人服务,可以为这部分人服务,也可以为那部分人服务,就可以冠以 people's。

本节以上提到,“人民法院”不应该译为 People's Court。其实,英语中 People's Court 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词组;但它并不是指中国的人民法院,也不是指任何国家的任何真正的法院,而是一个自 1981 年以来在美国播放了 20 多年的电视节目的名称。在这个节目中,由退休法官或政客(如前纽约市长)充当“法官”判决小额民事“诉讼”;诉、辩双方都是一般民众,自愿与节目制作公司签约,放弃上真法庭的权利,而根据这个“仿真”的“电视法庭”的判决解决他们的纠纷。无论仿真“法官”怎样“判决”,节目制作公司都向诉辩双方另外付款作为劳务工资。一开始这个节目每天 30 分钟,播放一个或两个“诉案”,后来延长到每天一小时,播放二到四个“诉案”。这意味着,从陈述、诘问到辩论、判决的整个过程都是在 15 到 30 分钟的时间里“速战速决”。

称其为 People's Court 有两层意思,一是指“民间”、“非官方”、“非正式”,强调这不是真正的法院,而只是一个模仿法院的电视节目;二是指“平民”、“小民”:在这个仿真“法庭”上,诉方索赔额不得超过 1500 美元;于是,案由全是些琐碎小事,也只有市井小民才愿意把琐事抖

接到全国甚至全球电视上去。

这个事例再次说明,People's 一般情况下不是一个贬义词,在许多情况下可以用作组织机构的名称,但不能把它用在政权机关如法庭的名称中,否则会造成错觉和误解。

注释:

① 在实行“两院制”的国家,两院(上院与下院,参议院与众议院,联邦委员会与杜马等等)不是相互平行、相互竞争的两个机构,而是同一个立法机构中两个相互串联、相互监督的部门。也就是说,不可能出现上院发布一个法律,而下院另外发布一个与之矛盾冲突的法律的情况。所有的法律都必须经过两院共同同意。

② “海军陆战队”也是个误译,更合适的译法是“海运陆军”、“海陆军”或“登陆军”。

③ 英语词 duke 意为公爵、大公、君主,有时泛指贵族。但 Duke University 中的 duke 源于该校创始人的姓 Duke。此人虽是烟草巨商、巨富,但并没有公爵或大公的爵位,大学冠名也无意自称“贵族”。所以,中文中通常音译该校为“杜克大学”是恰当的。但是,作为一所第一流的私立大学,该校收费昂贵,所以学生中多富家子弟。当北卡师生自诩 People's,并以此与 duke 对照时,就是利用词意的巧合揶揄对方的贵族性质。

参 考 文 献

- [1] 赵心树. 选举的困境——民选制度及宪政改革批判.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
- [2] 赵心树. 国际传播中的信息翻译与字词翻译——以“中国共产党”的英译为例. 国际新闻界. 2004a. 第4期,总第126期,12-17, 24.
- [3] 赵心树. 细释冠名的十加一原则. 中国传媒报告. 2004b(5):113~118.
- [4] 赵心树. “合法”与“合法”的困惑及其他.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编),《政治文明与中国政治现代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汇编·(2)·制度理论与改革实践:263~301,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2004c.
- [5] 赵心树. 细释冠名的十加一原则. 罗以澄、秦志希、夏倩芳、王瀚东(编).《新闻与传播评论·2004年卷》武汉:武汉出版社. 2005:49~56.
- [6] 赵心树、翁玮阳、赖俊卿. 走出选举的困境——说历史故事,谈民主未来. 台北:亚太出版公司. 2004.
- [7] 钟新. 传播学和新闻学的昨天、今天与明天——访美国北卡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赵心树教授. 钟新、周树华(编). 传媒镜鉴——国外权威解读传媒教育.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6:161~179

Chen Linghui: PH. D. ,Universite de Paris 2,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sound and image in management, Tain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12. 王 芳: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媒介文化。

Wang Fang: PH. D. Candidate,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edia culture.

13. 赵心树: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博士。

Zhao Xinshu: male, Director, Center for Research in Mass Communication; professor,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

14. 李 聪:北卡罗来纳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Li Cong: male, PH. D. Candidat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15. 金兼斌:博士,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2006—2007 年度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学者。

Jin Jianbin: PH. D. ,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From May 2006 to January 2007, he is also a visiting scholar of 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Oxford, UK.

16. 谭晓: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

Tan Xiao: Master,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currently an official of central government.

17. 熊澄宇:博士,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Xiong Chengyu: PH. D. ,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18. 伯提·阿拉苏塔里:芬兰坦佩雷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系教授。

Pertti Alasuutar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Tampere, Finland.

19. 克瑞格·凯罗: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安能博格传播学院助理教授。

Craig E. Carroll: associate professor, 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Carroll'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porate reputation and the news media.

20. 麦克斯韦尔·麦考姆斯: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Maxwell McCombs: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Texas.

21. 强月新: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

Qiang Yuexin: Ph. D. ,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22. 张明新: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大学新闻与传播系教师。

Zhang Mingxin: Ph. D. Candidate,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Lecture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Hubei University.

23. 皮特·戈德威: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

Peter Goodwi: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U. K.

24. 赵月枝:加拿大西门菲沙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加拿大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国家研究教授。

Zhao Yuezhi: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Canada Research Chair in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25. 约翰·斯多雷:英国桑德兰大学媒介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John Storey: Professor of Cultural Studies, Director of Research Centre , Centre for Research in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Sunderland, U. K.

新闻文本的建构:对“大陆向台湾赠送大熊猫” 报道的五要素分析

王 芳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运用“戏剧五要素分析法”,对“大陆向台湾赠送大熊猫”事件进行新闻文本的分析和解读。比较了《人民日报》、《中国时报》以及《自由时报》如何通过各自的叙事策略对该事件中的五要素以不同的处理,使报道呈现出不同的路径和方向。《人民日报》更多地展现了“目的”和“人物”要素,塑造出一种积极主动、和平团结的形象和愿望。《中国时报》则通过淡化台湾执政当局和相关部门对赠送“手段”上的“质疑”色彩,积极参与到赠送和接受大熊猫的“行动”过程中去。《自由时报》更突出“手段”上的“不合理”以及把主题转移到对方“人物”要素上的叙事策略,传达了对赠送大熊猫的“消极”和“反对”声音。不同的叙事策略反映了不同的意识形态,与其生产者的社会和政治态度密切相关,对受众的认知也可能产生相应的影响。

关键词:戏剧五要素 叙事策略 意识形态 认知

The Strategies of Media Narrative: a Pentadic Analysis of the Newspaper Coverage of “Chinese Mainland Offering Giant Pandas to Taiwan”

Abstracts: The paper mainly applies pentadic analysis to the newspaper coverage of “Chinese Mainland Offering Giant Pandas to Taiwan”, comparing the narrative strategies of People’s Daily, China Times, Liberty Times which use the different methods about the pentad, and then present the different way. People’s Daily mainly shows “Purpose” and “Agent”, which shapes positive image and peaceful desire. China Times weakens the questions from authority in Taiwan and “acts” zealously. While Liberty Times conveys negative response through the given “unreasonable” “agency” and thesis-transform to the counter “agent”. The different narrative strategies reflect the different ideology, correlating with the social form, political attitude and media system, which may also influence audience’s cognition and belief.

Key words: Pentadic Analysis Narrative strategies Ideology Cognition

应用符号学在英译“人民”时的应用

赵心树 李 聪

内容提要:本文简述了“应用符号学”中的翻译理论,特别是这一理论中的“传通译”和“词字译”概念。运用这一理论分析含有“人民”的词汇的英译,本文发现,“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警察”、“人民解放军”等一系列常用词、关键词的标准英译都是错误的,并讨论了改正方法。本文也发现,“人民日报”、“人民出版社”、“人民银行”、“人民医院”等另一些常用词的流行英译是恰当的,可以沿用。本文还讨论了“人民大学”的英译。

关键词:应用符号学 词字译 传通译 人民

Applied Semiotics i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Renmin”

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pply a set of theories, called “applied semiotics,” to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several Chinese terms containing “Renmin,” typically translated as “people.” The authors argue that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 called “word-character translation,” can lead to serious er-

ror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communication translation," strives to maximize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target audience receive accurately and efficiently the message as intended by the message sender. Using the communication approach as an analytical tool, the authors found that the typical English terms such as "the People's Congress," "the People's Government," "the People's Court,"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 "the People's Police" and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re mis-translations of the respective Chinese terms. Other translations, such as "the People's Bank," "the People's Dail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People's Hospital," and "the People's University" can be appropriate.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the two types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Applied semiotics Word-character translation Communication translation Renmin People

媒介使用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

金兼斌 谭晓 熊澄宇

内容提要: 本文探讨了媒介、特别是新媒介的拥有、接触和使用对人们的生活质量或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分析数据基于作者于2003年1月在北京市所做的“信息时代新媒体应用情况”调查。结果发现,拥有和使用互联网对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具有负面影响,而拥有电话则有助于人们的生活满意度的提高;使用计算机和上网时间越长,人们的生活满意度越低;消遣性上网活动与负面的媒介使用感受相联系,而建设性上网活动则与正面的媒介使用感受相联系。由于媒介使用与人们的休闲方式密切相关,本研究还分析了不同的休闲方式与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群体活动型休闲活动与人们的生活满意度是正相关的。从本研究的结果看,大部分传统媒介和诸多新媒介,包括电视机、录像机、传真机、数码相机、摄像机、VCD/DVD/CD/MD/MP3、游戏机、有线电视、手机、BP机等,人们对其拥有和使用情况,并不对人们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总的说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使用对生活满意度的解释能力是微弱的。对上述研究发现的现实意义,本文也做了相应的讨论。

关键词: 媒介使用 新媒介 生活质量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Use and Life Qual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ssession/use of new media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Based on a survey on the usage of new media in Beijing in January 2003,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possession and use of the Internet is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 level of satisfaction of life, while the possession of telephone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people's satisfaction of life. The longer a person use computer or the Internet, the lower is the level of his satisfaction of life.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creational use of the Internet leads to the negative feeling of media use while vocational use of the Internet is related to the positive feeling of media use. Due to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use and people's entertainment, this study also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yle of entertainment and people's satisfaction of life. It is found that the participation of group entertainment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people's satisfaction of life. However, at least based on the current study, the possessions and uses of many traditional and new media, including TV, video recorder, fax machine, digital camera, digital video camera, VCD/DVD/CD/MD/MP3, game player, cable TV, mobile phone and pager etc., are not related to people's satisfaction of life. Generally speaking, the use of new media, including the Internet, only explains weakly about the satisfaction of life. The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are also discussed.